

胡绳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史学交流

张泽钊

【提要】 作为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胡绳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参加中外学术交流活动,为推动中外史学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他与以井上清为代表的日本史学家结下深厚情谊,推动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流。他支持中国史学界了解并研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拓宽研究视野并吸纳其中合理部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推动中国史学自身发展,增强中外史学交流的学术基础。他参与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是这一时期学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史学与时代的互动。

【关键词】 胡绳 中外史学交流 改革开放 学术外交

胡绳(1918—2000 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担任领导工作,1982 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1998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一时期,他多次参加重要的中外学术交流活动,为推动中外史学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活动对他晚年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胡绳晚年的学术活动多有研究,对他的与时俱进和奋力开拓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有“胡绳现象”之说,但对他晚年为推动中外史学交流所发挥的作用,尚有探索的空间。^① 本文将重点研究该问题,特别是胡绳表现出的前述典范意义,进而总结这一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的得失。

一、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建立联系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代世界最具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其影响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运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也可以看到一定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为反思侵略战争、反对天皇制、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带来的阵营对抗,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

^① 学界关于胡绳晚年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述比较丰富。例如,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高华:《略论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0 期;杨奎松:《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读胡绳遗稿札记》,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 1 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1—20 页;王文滋:《胡绳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3 年。与此同时,就中国史学家在推动中外史学交流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个案研究相对薄弱,赵庆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参见赵庆云:《刘大年与中日史学交流》,《北方论丛》2022 年第 5 期。

在反省侵略战争、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斗争中迅速复兴。^①远山茂树、井上清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跃于日本史学界,并在中国引起关注。195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井上清的《日本现代史》(第1卷);195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远山茂树的《日本史研究入门》。随着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也在日本得到传播。1974年,胡绳的成名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经小野信尔、狭间直树、藤田敬一翻译,由平凡社在日本出版。“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中国史学界与外界的直接联系几乎中断。尽管藤田敬一曾于1971年5月跟随井上清等人访问北京,但当时胡绳正遭受错误批判,其著作也被封禁,因此他此行并未见到胡绳,以致对胡绳的个人情况完全不了解。^②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史学界走出“文革”的阴霾,迈向史学发展的新纪元。中外人员往来的逐渐开放为中外史学家直接交流提供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然渴望与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交流。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了解并不多,研究得很不够。^③例如,《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介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章《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作者是英国学者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④受中苏关系影响,这一时期,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术交流不多。据《中国历史学年鉴 1981》统计,在1980年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中,仅有6月18日罗马尼亚中央历史、社会、政治研究所的《历史年鉴》杂志代表团访问南京一例,且此次活动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⑤此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有联系,且彼此较为熟悉的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只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双方都曾引进出版对方的著作,因此,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两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往迅速增多。

1981年10月21—23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东京举行。胡绳率团前往,并发表“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的演讲。这篇演讲主要谈论三个问题:辛亥革命是不是一次革命、辛亥革命是不是一次必要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性质是什么。^⑥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张枏和王忍之主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等重要史料汇编流传到日本。^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史料编辑和出版工作有力推动了日本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提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有过广泛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被视为评价中国

① 参见张世均:《日本现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张经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张艳茹:《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

② 参见狭间直树:《难忘胡绳先生》,郑惠、姚鸿主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39页。

③ 参见孔令平、冯国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7年第5期。

④ 参见约翰·布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流派》,钱乘旦译,《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

⑤ 参见《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中国历史学年鉴 198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页。

⑥ 胡绳:《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310页。

⑦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全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8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1982年版;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1977年版。

资本主义发展、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根本问题。^① 改革开放之初,赴日交流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往往要回答这一问题。例如,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刘大年应邀赴东京大学讲学,他的讲座题目正是《论辛亥革命的性质》;^②1979年11月,章开沅应邀访问京都大学,在与市古宙三、野泽丰、石田米子等学者的交流中,该问题也是讨论的核心。^③ 胡绳的演讲回应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关切。

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流建立在彼此了解、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双方虽有共同的理论和方法,学术关怀却不尽相同。胡绳的演讲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在辛亥革命性质问题上的看法,即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革命史叙事框架中,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一环,既承认其在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进步性,也通过论证其失败以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胡绳在演讲的最后将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即农民为主体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三阶段,是对该框架的概括。^④ 在演讲中,胡绳也回应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关切:“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这丝毫没有贬低辛亥革命的意义。”^⑤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深受战后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思想影响,以中国通过革命走上近代化道路批评日本以维新运动走上近代化道路,^⑥这种意识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表现为拔高辛亥革命性质。其中,石田米子的主张最为激进,提出辛亥革命是一场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认为将辛亥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对它的贬低。^⑦ 由此可见,胡绳的演讲是建立在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坦陈当时中国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主张,回应对方的关注点。

胡绳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联系的一个目的,是声援他们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态度和为正义发声的壮举。1985年8月10日,刘大年在致胡绳的信中反映了他从来访的广岛大学杨启樵处获悉,当时日本舆论界在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左”“右”两种态度,其中日本左派“揭露日本侵略军屠杀残害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谴责侵略者,大义凛然,替中国人讲话”。^⑧ 尽管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对日本的舆情和思潮并不熟悉。当时,在日本国内公开反省侵略战争,呼吁日本各界正视历史责任的群体就是日本左翼思想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因此加强同这一进步群体的联系尤为关键。

在与胡绳有交往的外国史学家中,井上清是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位。为推动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流,井上清多次受邀访华。1985年9月28日,胡绳陪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井上清夫妇。1990年,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胡绳再度邀请

① 参见石田米子「最近の日本における辛亥革命研究の諸成果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39卷第1号、1980年6月;野泽丰『辛亥革命』、岩波書店、1972年;村田雄二郎:《超越“纪念史学”——日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会议》,张玉萍译,《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② 赵庆云:《刘大年中日史学交流》,《北方论丛》2022年第5期。

③ 参见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页。

④ 参见胡绳:《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309—310页。

⑤ 胡绳:《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309页。

⑥ 参见王振锁、乔林生、乌兰图雅:《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174页。

⑦ 参见石田米子「最近の日本における辛亥革命研究の諸成果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39卷第1号、1980年6月;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第292页。

⑧ 刘大年:《致胡绳》(1985年8月10日),王玉璞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井上清访华。同年8月31日至9月3日,“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井上清赴会并发言。1991年9月17—20日,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行,井上清受邀参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言道:“我们一定要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日中两国人民,告诉两国的子孙后代。”^①胡绳对井上清的礼遇,不仅因为井上清为推动两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流作出重要贡献,更因为他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发出了正义之声。为呼应1970年留美中国学生掀起的保钓运动,反对美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言行,1972年2月,井上清在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刊物《历史学研究》上发表《钓鱼岛的历史与归属问题》,^②明确指出钓鱼岛及其周边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正因如此,井上清受到日本右翼的攻讦。右翼学者奥原敏雄发表《尖阁列岛问题与井上清论文》,^③公开与他论战。因此,声援井上清是胡绳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这也是一种道义责任。井上清并非日本共产党党员,但曾是其重要支持者。中苏论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选择支持苏联共产党,而井上清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1967年“善邻学生会馆”事件发生后,井上清更与日本共产党分道扬镳。“文革”期间,以井上清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大多支持“文革”。因此,“文革”后,井上清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十分尴尬。^④在井上清面临困难时,中国史学界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可谓患难见真情。

中国史学界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深入互动,其基础是双方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和治史路径,这种互动也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情谊。在这一过程中,胡绳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促进了中日史学交流的多元化。这一交流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在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历史责任、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与欧美中国研究的隔空交锋

尽管在学生时期,胡绳并未系统了解过西方史学,但在他将研究方向转向史学后,开始注意西方史学著作。胡绳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能够阅读英文学术著作,早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还曾短暂跟随德国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学习过德语。^⑤在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胡绳共引用22种外国文献,其中英文原著19种,中译本著作2种,转引文献1种。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胡绳说道:“几本英文的书使我得益很多。”^⑥这一方面是指胡绳借此掌握了更多的史料,另一方面则是了解西方学者的观点并对其中的帝国主义主张加以反驳。尽管立场与方法不同,但胡绳从未否定西方史学的价值,这在他后来的史学实践中也从未改变。

改革开放之初,胡绳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范围内学术的发展状况。

① 黄仁国编著:《刘大年年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3—464页。

② 井上清「釣魚諸島(尖閣列島等)の歴史と帰属問題」、『歴史学研究』1972年2月号。

③ 奥原敏雄「尖閣列島問題と井上清論文」、『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第4卷第1号、1973年3月。

④ 参见俞天任:《冰眼看日本2》,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6页;狭间直树:《难忘胡绳先生》,郑惠、姚鸿主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第339页。

⑤ 参见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⑥ 胡绳:《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1985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中国学者“要有勇气有能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对国外学术思想“要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批评”。^① 1986 年 10 月 29 日,他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提出:“翻译、介绍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进行评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重视这项工作,注意培养学术翻译的人才和能够进行分析评论的人才。”^②在胡绳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都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史学编译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继续推进“剑桥中国史”系列的翻译出版,近代史研究所组织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组织编译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为中国史学界了解外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胡绳的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协办的《史学理论》(1992 年更名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创刊。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史学界缺乏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了解,杂志的最初任务以介绍、评述西方史学理论发展情况为主。因此,杂志在创刊之初的内容 70% 为介绍、评述国外成果,30% 为国内研究成果。^③《史学理论》的创刊为中国史学界了解西方史学理论打开了一扇窗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界大力加强与欧美史学界的联系。这一方面是受对外开放政策激励,另一方面中国学界也注意到几十年间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学界在欧洲传统汉学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研究”(China Study),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研究以认识、应对当时中国为主要研究目标,由今溯古地研究中国是其最大特点。以哈佛大学为中心,费正清(John Fairbank)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研究专家,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前文所述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与费正清及其弟子多有关联。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与胡绳在治学领域上高度重叠,涉及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等方面,因此二者的相遇必定会碰撞出火花。

引入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并非只是学术交流问题,意识形态冲突也是中国学界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89 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理论观点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重点。^④ 受此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胡绳对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更多地表现出批判的一面。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绳专门阅读了数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引进的相关外国学术著作,包括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特里尔(Terrill)的《毛泽东传》、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

① 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7 页。
② 胡绳:《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胡绳全书》第 3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7 页。
③ 参见蒋大椿:《我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陈启能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史学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9 页。
④ 参见胡绳:《总结经验 振奋精神 为把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而奋斗——在 199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 646—647 页。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等,^①并对其中的观点作出点评。在阅读过程中,他最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欧美研究者们对“文革”起源的论断及其发展线索的总结。据金冲及回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回答”。^②如何总结“文革”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编写这部简明党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回答了相关问题,但有关学术研究在国内只能说是刚刚起步。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前,国内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文革”史著作,其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影响较大。^③该书延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述,认为“文革”是“党的八大后‘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长期积累并急剧发展的必然”。^④与此同时,外国的“文革”史研究已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影响。在《大动乱的年代》序言中,廖盖隆说:“我们都不愿意‘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现象出现。”^⑤发出这一感慨正是因为外国“文革”史研究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国内,并受到读者关注。据麦克法夸尔回忆,1990年夏,他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遇到一位在翻阅《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前两卷中译本的读者,读者告诉他“我在等第三卷呢”。^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都将“文革”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导言中,麦克法夸尔提出:

要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定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问题。但是正像人类社会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⑦

胡绳明确反对“权力斗争说”,他曾对写作组成员们回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的情况:“外国人很难懂,认为是权力之争,对毛主席为什么忽然要把少奇搞掉有点奇怪。”^⑧他特别提出:“要驳毛主席发动‘文革’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他还是真心实意地想把中国搞好,也没有像四大家族那样在中间得到个人利益,发国难财。”^⑨他明确主张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不牵涉任何的个人私利。“权力斗争说”将问题集中于个人,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既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污名化,也将问题简单化。既然如此,胡绳就必须对党的八大后十年的历史给出不同的论述。

①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2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求实出版社1989—1990年版;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谢亮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广京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特里尔:《毛泽东传》,刘路新、高庆国译,胡为雄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金冲及编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③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建坡:《“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9年。

④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6页。

⑤ 廖盖隆:《序言》,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页。

⑥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王笑歌译校,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⑦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殷钟睿译校,莫怀远统校,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⑧ 金冲及编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2页。

⑨ 金冲及编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5页。

他就“文革”爆发的原因提出“两种倾向”说：

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①

胡绳的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延续并丰富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从中共党史研究史来看，这一论述不仅突破了以路线斗争为主线的党史论述模式，更没有落入传统政治史研究中“权力斗争论”的窠臼。“两种倾向”说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当时“非毛化”的舆情。胡绳能够提出这一主张，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胡绳曾与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一起，跟随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在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问题上的思考。因此，他提出“文革”之前的十年探索是正确和错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

尽管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期间，胡绳对欧美的中国研究著作以批评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全然排斥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在读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胡绳认为“费正清讲苏联模式和探索中国式道路的问题，这有点道理”。^②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作者将1949—1965年的新中国史分为“苏联模式”（1949—1958年）和“探索中国式道路”（1958—1965年）两个阶段。胡绳赞成这种概括，但在具体划分方式上有不同见解。他主张将党的八大作为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将党的八大到“文革”之间的十年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此后，这一划分方式被国内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者广泛接受。

胡绳对外国史学研究及批评的目的，在于对照中国已有的研究，发现问题并提出见解，以期达到推动中国史学进步的效果。借鉴西方史学研究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作为他者，在研究视角上有自身特点，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上或许给中国学者带来某些启发。与此同时，引入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必然会对中国历史学产生一定的冲击，甚至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但对其简单否定甚至加以排斥，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面对不同意见，胡绳坚持以我为主，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事实加以科学分析，提出中国史学家的见解。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优势，也是坚守思想阵地、理论阵地和舆论阵地的根本要求。

三、胡绳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参加会议、讲学交流、介绍理论、搜集史料、翻译书籍等学术交流活动蓬勃展开。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胡绳多次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率领学术代表团参访外国学术机构、参加国内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② 金冲及编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09页。

外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签订重要的学术文化交流协议。虽然这类活动时间较短,但往往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属于学术外交的范畴。胡绳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政治人物,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就担负的政治责任而言,在当时中国史学界,胡绳堪称独一无二。因此,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也是探讨胡绳参加中外史学交流活动的应有之义。

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外政治环境有利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恢复和开展。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两国人文交流逐步恢复。1982年4月,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年会在芝加哥召开,同时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胡绳率团与会。4月2日晚,年会特别增加了“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成立专题国际讨论会”。讨论会共提交了十篇论文,其中九篇为两岸学者的文章,另一篇为日本学者的文章。在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中,胡绳贯彻了廖承志、宦乡在会前提出的“学术讨论,落落大方,求同存异,长期着眼”的原则,对于会上章开沅和张玉法围绕辛亥革命性质之争没有搞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强调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① 借由这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代表团与旅美华人史学家群体建立起联系,为了解外国史学发展情况、增进中外史学交流打开了一条通道。^②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在胡绳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窗口作用,史学工作者积极参与两国人文交流,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苏关系的恢复。1986年10月12—20日,刘大年率团前往莫斯科,出席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和苏联汉学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也是唯一获邀参会的外国代表团。会议期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Титаренко,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对中国代表团提出,邀请胡绳正式访问苏联。^③ 1987年5月,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科学部主任、院士费多谢耶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Федосёв)一行12人访华,胡绳会见并宴请代表团,签订两院为期两年的学术交流协议。1989年5月15—18日,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5月底,胡绳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并续签学术交流协议,涉及历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多个领域。

学术外交是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官方外交受阻时,可以作为对外交流的有效渠道。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与西方阵营的关系急转直下,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宣布对华经济封锁,但这并没有完全阻隔中外史学交流。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参加会议。胡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要“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④ 同一时期,受1989年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的影响,国内也出现了反对对外开放、重提阶级斗争的声音,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再次出现。这一声音也传到了国外,中国是否会坚持改革开放一时间成为问题。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中日关系的改

① 参见胡绳:《在芝加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胡绳全书》第3卷(下),第765—766页。

② 参见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第300—301页;卢晓衡:《我院对台学术交流的发展历程》,胡广翔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综合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7—650页;张仲礼:《我所了解的美国汉学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6—79页。

③ 参见黄仁国编著:《刘大年年谱》,第392—393页。

④ 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80页。

善成为打破西方对华封锁的突破口。同年 11 月 12—22 日,胡绳应日本亚细亚大学校长、史学家卫藤沈吉的邀请访问日本,并发表题为《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演讲,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的基本政策”。^①这一讲话表明了中国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在国内外取得良好反响。

改革开放之初,摆在中国史学界面前的是要恢复与世界史学界的联系。不同于双边学者互访,五年一届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全球最大的史学交流盛会,与会各国史学家齐聚一堂,彼此交流。1980 年,中国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会。1984 年 7 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秘书长阿维勒夫人访华,胡绳与马洪、刘大年等人负责接待商谈,促成了 1985 年中国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大会。此后,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参加了历届会议,并在 2015 年以东道主身份成功举办第 22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外交的起步期,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还处于边缘位置。胡绳参加的国际学术活动,特别是国际史学交流活动的主题都围绕着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与一般的历史理论问题、原则问题,以及国际史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无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名家辈出,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胡绳更是将个人的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相结合。换言之,中国史学家与国际学者的关注点不同。1995 年,戴逸在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 18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后,曾有这样的感慨:

国际历史科学论坛上讨论的都是和现实密切相关的大问题,从全世界的宏观视野进行研究。如民族冲突……移民问题……妇女问题……历史学家们关心这些大问题,追踪其历史演变,这可以作为我国确定研究课题时的参考。^②

其二,中外学术交流存在语言障碍。1985 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上使用的是英语、法语和德语,这就给外语能力不足的中国学者造成了语言上的困难。中国学者的成果以中文写作,这无可厚非,但也导致了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1986 年,刘大年访问苏联期间,季塔连科提出介绍一些书让苏方翻译,他便介绍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当时苏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更加关注,因此苏方并未翻译这部近代史专著。^③1992 年 7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中国学者著作的版权输出更需要外国出版界的积极引进。在 2023 年举办的第 29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次性实现了英语、日语、韩语、越南语、阿塞拜疆语、印度尼西亚语的版权输出,让那些不懂中文的外国学者有机会阅读到胡绳的这部名著。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外交之所以兴起,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因素。内因是国门打开后,中国学界看到与外国学术界的差距。1985 年,胡绳在讲话中提出:“要承认有些方面确实我们有弱点,也许甚至于差几十年。”但是,他也反对妄自菲薄,“在有些方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当

^① 胡绳:《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胡绳全书》第 3 卷(上),第 107 页。

^② 戴逸:《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语冰集——戴逸随笔》,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2 页。

^③ 参见黄仁国编著:《刘大年年谱》,第 393 页。

然,我们还要努力。”^①学术外交兴起的外部因素是国际学界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学术合作。例如,1987年4月,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代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邀请胡绳访问美国,后来他写作“上海三部曲”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帮助,在序言中还对胡绳表示感谢。^②

总之,中外史学交流是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侧重方向与官方外交政策相辅相成。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胡绳参与的学术外交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官方外交之外,民间外交是对外交流的“第二通道”。改革开放后,以中外史学交流为代表的学术外交积极助力官方外交。学术外交有着专业性强、讨论自由等独特优势,其交流对象往往是有着官方背景的专业人士,这一群体可以对所在国的外交政策直接产生影响。1987年,胡绳访问美国期间的一项重要行程是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演说,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是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智库之一。以民间学术外交为支点,借助国际交流平台,可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积极对外开放的中国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胡绳参加的中外学术交流活动正是学术外交参与民间外交中来的生动写照。

结 语

对外开放政策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与外国史学交流的契机,中国史学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下开启了新时期的转型。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胡绳在中外史学交流过程的作用,不能离开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更不能忽视特定的政治及社会背景。这一问题的研究意义在于要以今天的视角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经验,以及以胡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留给后学的借鉴意义。

其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长足进步,并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影响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并得到积极回应。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流迅速增加,胡绳、刘大年、井上清等中日老一辈史学家在其中的推动居功至伟,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是无法取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共同谱写新篇章。

其二,面对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胡绳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学界了解战后欧美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坚守意识形态和舆论阵地。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对这些领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与当前的政治紧密相关。中国史学界如何拿出兼具学术性、思想性和教育性的著作与被引进的欧美史学著作相抗衡,是胡绳晚年十分关注的问题。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过程中,他充分关注欧美学界的成果,吸收其中的合理部分,对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并提出中国史学家的观点。胡绳的学术使命感和理论自觉是后辈学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在人文社科领域,以欧美学术完全取代中国学术就会丧失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何面对西方史学的影响是中国史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必须慎重回答的

① 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638页。

② 参见魏斐德:《魏斐德上海三部曲:1927—1937》,章红等译,岳麓书社2021年版,“鸣谢”,第3页。

问题。

其三,对于胡绳个人的研究要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胡绳不仅是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人物,他的学术生涯与活动都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相关。打破政治话语与学术语言的隔膜,向世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宣传对外开放政策,这是胡绳参与中外史学交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外史学交流是学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体现中国特色,发出中国声音,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其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仍需继续扩大。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乃至学术交流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长期积累的话语权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国人发现与西方存在巨大差距并急于学习的心态。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胡绳参与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胡绳已经完成了他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坚持中国史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走出国门参与世界范围的学术对话交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不存在缺憾。对西方学术进行学习、模仿、应用,几乎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一路径在自然科学领域不易产生太大的问题,自然规律具有普遍性;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只有领先、落后之分,其评价标准是客观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却并非如此,各国国情不同,学术发展有着各自的历史和传统。中国学界对世界的知识,特别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知识大多来自于西方,缺乏对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的非西方世界的直接观察,更缺少对话,不自觉地就会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因政治因素而兴起的同亚非拉地区的史学交流,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得到扩大,而是退居到了角落。时至今日,21 世纪已过去将近四分之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什么。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和人民来说,帝国主义通过血腥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发展资本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也不能再走,那么,如何在政治“去殖民化”后,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去殖民化”就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今中国史学家要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观察世界历史演进的脉络,不断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这需要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史学界的交流,这在认识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进步意义是与西方史学交流难以得到的,也是中外史学交流亟待拓展的方向。

(作者张泽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2488)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Hu Sheng and Chinese-Foreign Historical Exchang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 Zhang Zezhao

As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Hu She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significant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H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histor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H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foste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Marxist historians from China and Japan, establishing profound friendships with renowned Japanese historians like Kiyoshi Inoue. Moreover, he supported Chinese historians to explore non-Marxist historiography, broadening their research perspectives, learning from its valid elements, and expressing Chinese historians' distinct viewpoint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By doing so, h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The historiographical exchange endeavors he engaged in constituted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academic diplomacy during this period, exemplifying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Social Quality: A New Dimension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 Yu Hualin, Liang Jingh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historiography.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quality" during this period opens a unique research dimension, as this concept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value pursuits. It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specific even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in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levant content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social quality as the entry point. It explores the scope of 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social quality aiming to initiate in-depth discussions.

From "Opposition Between Two Zeitgeists" to "Clash of Methodologies":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s on the Debate Between Humanism and Scholasticism // Zhu Xiao

Research on the debate between humanism and scholasticism has undergone three paradigms i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academia: the traditional school, the revisionist school, and the new revisionist school.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paradigm, influenced by Jacob Burckhardt, interpreted the debate as the opposi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Zeitgeists. In the 1940s, the revisionist school, influenced by Paul Oskar Kristeller's theory on de-ideologized humanism, argued that *Studia Humanitatis* and Scholasticism were two independent but co-existing disciplines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re was no substantial conflict between them. In the 1970s, the new revisionist school,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Hans Baron and Eugenio Garin, not only acknowledge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sides during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ut also addresse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ising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during the Northern Renaissance. These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their evolution reflect the clos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ideology i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academia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It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imes.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and Scholarly Debates // Cao Fengyu, Wang Wenqi

The Dar es Salaam School is an important faction of thought withi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t was